



TAI-GANG-AO JI HAIWAI HUAREN WENXUE

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文学

主编 王淑芝



TAI-GANG-AO JI HAIWAI HUAREN WENXUE

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文学

主 编 王淑芝

副主编 赵 燕 王子龙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文学/王淑芝主编. —2版.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5681 - 0623 - 8

I. ①台… II. ①王… III. ①华人文学—文学研究—世界—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2332 号

☐ 策划编辑:魏 昆

☐ 责任编辑:吴永彤

☐ 责任校对:吴应明

☐ 封面设计:曹 涛 刘 萌

☐ 责任印制:刘兆辉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邮政编码:130117)

网址:<http://www.nen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燃气工业园榕花路 3 号(065600)

2015 年 3 月第 2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185 mm×260 mm 印张:16 字数:388 千

定价:62.00 元

自序

《台港澳及海外人文学》是我讲授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文学这门课程的集大成的产物。是我多年来多方收集讲课资料，经过课堂讲授，认真筛选之后整理出来的书稿。

如果说中国文学是一座五彩缤纷的锦绣花园，那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文学就是散发着芬芳的一簇簇鲜花。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这些地区的文学历史和现状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于是需要我们这些从事研究和教学的人们做一些拓荒般的劳动。虽然以往有很多同行在这个园地栽种过不少奇花异草，但真正把这些地区和海外华人们的浸透着血泪的一簇簇鲜花植于一园的劳动，还比较鲜见，于是便有了一种想法，想写一本稍有新意、简明扼要且较为全面的关于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文学的书，于是就有了这本《台港澳及海外人文学》。

该书首先是作为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的试用教材使用了2年，而后在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现得以正式出版。

因为我对台湾文学的偏爱，更因为台湾文学的成就，本书关于台湾文学所占比例偏大，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文学，在其充满悲情的特定历史长河中，或为了对抗强权，或为了民族回归，或为了文化认同，自始至终做着不懈的努力。正如余光中在《白玉苦瓜》中所言：“不幸呢还是大幸这婴孩/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直苦瓜/皮靴踩过，马蹄踩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所以，这本书就是一次特别的精神之旅，对文化的一次特别的书写。

本书第一编《台湾文学篇》为王淑芝主编；第二编《香港文学篇》为王子龙主编。第三编《澳门文学篇》、第四编《海外华人文学》为赵燕主编；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田青、周艳华教授和隋玉英老师等的大力支持，在此致谢。

王淑芝

【目 录】

第一编 台湾文学篇

导 论	1
第一节 台湾新文学百年历史扫描	1
第二节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辩证	5
第一章 日本侵占时期的台湾文学	8
第一节 祖国大陆移民文学与台湾新文学的萌芽	8
第二节 五四运动与台湾新文学运动	12
第三节 新文学的“星星之火”与张我军	17
第二章 发展期的台湾文学	22
第一节 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概述	22
第二节 台湾新文学之父——赖 和	27
第三章 “战斗文艺”与乡愁文学	70
第一节 台湾新文学的重建概述	70
第二节 “战斗文艺运动”概述	73
第三节 反共文学的猖獗和衰落	76
第四节 “乡土文学之父”钟理和	78
第五节 乡愁思潮与女性文学的勃兴	94
第六节 “她从城南来”——林海音的创作及意义	98
第四章 汹涌澎湃的现代诗潮走向成熟的现代小说	122
第一节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概述	122
第二节 三足鼎立的现代派诗社及其诗歌创作	127
第三节 乡愁母题、诗美建构及超越——论余光中诗歌的“中国情结”	134
第四节 台湾小说的骄子——白先勇	142
第五章 重新崛起的乡土文学	153
第一节 重新崛起的乡土文学概述	153
第二节 乡土文学思潮论争	157
第三节 “海峡两岸第一人”——陈映真的创作及意义	161

第六章 多元并举的台湾文学	170
第一节 概 述	170
第二节 直面历史与现实的政治小说	173
第三节 凸显女性主体精神的新女性文学	177
第四节 勇闯“性”禁区的女作家——评李昂的小说创作	179

第二编 香港文学篇

第一章 香港文学发展历程述略	183
第一节 香港文学的萌芽	183
第二节 香港文学的发展	185
第三节 香港文学的性质	187
第二章 香港的小说	189
第一节 刘以鬯的小说	189
第二节 西西的小说	195
第三节 徐讦、徐速等南来作家的小说	199
第四节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	205
第五节 金庸的武侠小说	207
第三章 张爱玲——作为上海的“她者”的香港	218
第一节 张爱玲生平	218
第二节 香港生活与香港传奇	220
第三节 华美而悲哀的——张爱玲小说里的香港定位	224
第四节 《茉莉香片》：理想父亲“缺失”的焦虑与困境	229
第五节 主要生活场景：“家”的失落与不安全感	232

第三编 澳门文学篇

第一章 澳门文学概述	237
第一节 澳门新文学的分期	237
第二节 澳门新文学的创作概况	240

第四编 海外华人文学篇

第一章 概 述	243
第二章 主要作家简介	246
第一节 聂华苓	246
第二节 赵淑侠	248

第一编 台湾文学篇

【导 论】

第一节 台湾新文学百年历史扫描

台湾的中华民族属性是毋庸置疑的。最早于《三国志·吴书二》中就有记载：孙权为“普天一统”，“遣将军卫温、诸葛直以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今台湾）及宜洲”。至隋，陈棱率兵万余抵流求，身后被祀为台湾“开山祖”。《隋书·东夷列传》记载：“流求国居海东，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此之流求，风土习俗、方位和文化系统皆与三国夷洲颇多相似之处，所以学者多认为即为台湾。宋以后历代王朝均在台设置行政机构。至明（1662），郑成功率兵驱逐荷兰殖民者，他在致荷兰驻台末任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郑成功率兵成功收复台湾后，按明朝政体在台湾建立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机制，使台湾地区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思想文明得以建构和向前发展。1895年，甲午战败，清廷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家家户户，欢欣无比，家家户户，祭祖谢神，向先民冥中告知台湾已归回祖国”。正是宝岛台湾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她多劫的命运，也由此凝成了一部独特的“血泪史”。而台湾的新文学便是以其沉重的步履和民族回归的浩然正气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学之途，并始终行进在中华民族文学的森森大川之中。

导源于祖国五四运动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以反日爱国精神和文学革新意识双轨并行的。1895—1945年这整整50年的日本侵占时期，在残暴的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地区从人身的抗争到文学的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腐败的清廷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闻之道路，有割弃全台与倭之说，不胜悲愤！……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

于是，整整半个世纪的日本侵占时期，不堪忍受亡国奴生活的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而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章。

与前仆后继的抗击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相呼应，反对日本殖民文化、保卫民族传统文化与应和祖国大陆新文学革命的运动则犹如地火运行，顽强悲壮，势不可当。

20世纪20年代，不论是在日本留学还是到祖国大陆求学或者是留在本土的台湾爱国青年，都纷纷以不同方式投入捍卫民族精神、革新文言旧体的运动当中。1920年，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组织成立以“研究台湾革新，谋求文化向上”为宗旨的“新民会”，创办《台湾青年》月刊，号召爱国青年“反抗横暴，服从正义”、“自新自强”，并在该刊载文指出，祖国大陆新近倡导的白话文学，负有传播文明思想、改造社会之使命，呼吁有光荣历史的台湾文坛应循此方向努力。1921年，台湾本岛一批富有民族意识的知识者组建台湾文化协会，推进以启迪民智、灌输民族思想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而台湾青年张我军则在北平接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鲁迅的教诲，将五四文学精神引进台湾，并严正宣布：“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和深入，不但接续和传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更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文学勇士，这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中最有血性的力量所在。当时，涌现出如张我军、赖和、杨云萍、林越峰、杨华、杨逵、龙瑛宗、张文环、吕赫若等一大批作家及其写就的大量以歌当哭的作品。而针对战争期（1937—1945）臭名昭著的“皇民化运动”，台湾作家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挣扎苦斗，或潜渡祖国大陆从事救亡文化活动，或介绍古典名著以保全民族意识，或冒着生命危险秘密从事汉文学创作。其中，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就是一部最有典范意义的爱国主义泣血之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得以光复并回归祖国。随着与文化母体的重新衔接和语言断层的重新熔续，台湾新文学如经烈火锻造的钢铁般愈发坚强挺立。一批因在日本侵占时期被迫接受使用日语写作的作家，宁愿给自己留下创作的空白也坚决摒弃日文写作，而顽强努力地学习母语；大批祖国大陆作家（指从祖国大陆来到台湾的作家，下同），如许寿棠、台静农、李何林、黄荣灿、姚一苇、田野、谢冰莹、孙达人、袁珂、雷石榆等则渡海赴台，和以杨逵为代表的台湾爱国作家（指生长在台湾的作家，下同）一起携手重新建设台湾新文学，并因此而掀起了以振兴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台湾文学的光复热潮。

1949年，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动，一大批文人随着国民党去了台湾，由此虽然实现了两个文学球根和文学精神的结合，也改变了台湾文坛的原有结构和创作队伍，台湾的文学发展在传统价值理性上与大陆母体也存在着深层次的深刻勾联，但此后却形成了相当特殊的文学景观。

台湾国民党当局在1949年困守台湾后，出于政治上统治和思想上钳制的需要，首先在全岛颁发了“戒严令”，随后则对全台湾进行了包括意识、文化、教育、外交等在内的全面“整改”；同时，客观地说，他们还出于稳定社会、安抚民众的需要，在经济举措上也做了较为切实的努力。当然，还由于其间获得了大量的“美援”和“日援”。因此，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社会基本完成了由静态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也完成了偏狭的政治取向和民族意识的驯化。随后，台湾国民党当局70年代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遗弃”而警醒，80年代受到世界政治风云的冲击和回归思潮的驱动而“解严”。至此，台湾社会体制虽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已经形成的偏狭的政治和民族观念则受到了来自全岛认同和回归潮流的审视和质疑，并由此而形成了一定的开放

局势。

在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下，台湾主流文学则经历了一个由偏狭到拓展的发展过程。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摆脱困境，同时为了把台湾建成所谓牢固的“反共”基地，实现他们“反共复国”的梦想，对文艺提出了“臣服”于其特定历史困境需要的规范和要求，把文艺纳入了他们“反共复国”的轨道。就在 1950 年初春，国民党退守台湾惊魂未定，蒋介石就指示国民党“文运会”主委、台湾文化界的领导人张道藩：要创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奖励富有时代性的文艺创作，以激励民心士气，发挥反共抗俄的精神力量。随后，台湾文化当局以张道藩为首成立了若干个文艺机构，并通过几乎所有的舆论、传媒手段，“号召”文学要“反共”，文艺要“战斗”。在台湾当局的直接操纵下，“反共复国”被视为台湾文艺家的“神圣”任务。一时间，以赤裸裸的政治功利为目的的“反共文学”以及在思想内容上看似比“反共文学”有所扩展而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战斗文艺”如洪水般泛滥。明显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意识偏执，对文学的残暴造成了文学背离民族传统、背离社会现实的滥殇。

在具体创作上，诸如陈纪滢的《荻村传》、姜贵的《旋风》等，虽不乏细节描写的生动，但那些被随意歪曲了的历史真相，那些被概念化处理了的作品人物，那些被模式化定格了的情节结构等的组合，充其量是一幅政治挂图。

不必赘言，“反共复国”自然成为梦呓。而且，为配合“反共文学”、“战斗文艺”，台湾当局还开展了所谓的“清除三害运动”，其中的“赤色的毒”，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还包括了五四、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令台湾当局始料不及的是，人为地隔绝与祖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尤其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进步文艺的联系，最终却使文学陷入了断层的尴尬，乃至催生了文学的反叛。正是这样，台湾文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沐浴了“欧风美雨”之后，不少文学青年对那些脱离了台湾社会现实生活的拙劣的“反共八股”，对那些政治挂图式的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化的倾向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和祖国大陆的母体文化联系已完全断绝，剩下的似乎就只有诉求于西方。于是，长达 1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现代派文学”则忽如千树万树领一时风骚。正如余光中所说，弄潮儿们“甚至对一切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都起了反感，至少起了怀疑。余下的一条路，似乎就只有向内走，走入个人的世界、感官经验的世界、潜意识和梦的世界。弗洛伊德的泛性说和心理分析、意识流手法的小说、反理性的诗等等，乃成为年轻作者刻意追慕的对象”。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样，此间的文学西化大多成为了陈映真所批评的“西方现代主义的亚流”。一些现代派创作恶性西化，走火入魔，晦涩难懂，逃避现实，也缺乏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所应有的批判。但是，毕竟它的反现实的姿态无疑造成了对“反共文学”、“战斗文艺”的一种拒绝，而且对于台湾正处在由静态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各阶层人们的形形色色的心态，它们所作的投射和艺术观照，无疑具有一种独特的史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像白先勇、於梨华以及欧阳子、王文兴等人的现代派文学创作，对于冲击荒原般的台湾文坛、丰富其艺术表现力还是有着不同寻常的积极意义。诚如他们所言，“我们不想在‘想当年’的瘫痪心理下过日子”，“我们有感于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于表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感情，所以我们决定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不过，面对特定时期的政治和民族的意志力，“艺术至上”的文学守望是难以为继的。

20 世纪 70 年代，台湾面临再度孤悬海外的危机，台湾当局则“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虚伪口号下疯狂地将中国人的心灵出卖为外国人心灵”。这样，高扬民族意识的乡土文学思潮蓬勃兴起，有如混浊太空中刮来的一阵春风，给原是出于追寻自我实则已失却自我的文坛注入了一股勃勃生机。“若干年轻人所提倡的‘乡土文学’，要使文学在自己土生土长的、血肉相连的乡土上生根，由此而充实民族文学国民文学的内容，不准自己的灵魂被出卖”，并以一批坚实的“乡土文学”创作取代了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坛的位置。这样，20 世纪 70 年代的台湾得以从狭小的个人空间跨入了广阔的社会领域。作为“乡土文学”中坚力量的黄春明、王桢和等人的创作，表现出了鲜明的社会倾向和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继承。尤其是享有“台湾的杜甫”之称的陈映真，此间的创作更是一个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相互渗透和突进的最好文本。其《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如《夜行货车》的意象、象征、意识流等现代派文学技巧的稔熟，正是表明文学对外来文化的一种超越。我们透过刘小玲和詹奕宏在迷蒙夜色中踏上回归乡土的“夜行货车”的决然，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启示。这里包括了文学创作如何处理继承与借鉴的意义，更彰显了回归乡土，高扬民族精神的意志。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应当说，发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乡土文学思潮及其创作，实际上已经在演练并张扬着传统的民族的文学所应具有自觉和使命感。即便是“拿现代派作家来说，他们正是在批评声中开始认识到认同传统的迫切性和关怀现实的重要性，以此来调整自己的创作路线……尤其是自 1950 年以来受内战及世界冷战结构影响形成‘反共抗俄’思想垄断。两种不同的创作路线，给 80 年代以后作家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艺术参照系。他们以后从事艺术革新，多半吸收现代艺术的不同长处建立自己的风格”。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政治动荡，台湾社会则充满了激变，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台湾发出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切呼吁下，炎黄子孙认同回归的潮流已然日甚一日。于是，台湾文坛上原已形成或各执一词的种种文学流派，主要是乡土和现代两大流派，经过排斥、吸收和融聚，都取得了各自的发展空间和态势，以往那种由某一文学流派固守一方、独霸一时的成规已轰然倒塌，代之而起的则是空前的开放景观。

首先是伴随着“政治解严”而来的“书禁”、“报禁”以及“史禁”等的解冻给文坛所带来的兴奋。鲁迅的《阿 Q 正传》着实让不少台湾当代文化人叹为观止。陈映真就不无感慨：“没有想到早在（20 世纪）30 年代我们祖国就有了如此杰出的作品。”随后，社会由主流意识形态为统领转而进入一个多元繁复的社会状态，整个文坛则形成了以直接描写台湾当代或历史上重大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的政治小说和以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变革的社会问题小说为主，又兼容其他文学思潮及其创作，譬如新女性主义文学、怀乡思亲文学、都市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及以娱乐功能为目的的休闲文学等在内的文学格局。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虽然在 80 年代中期由于“解严”而释放出来的政治能量已经逐渐衰退，但是台湾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生存仍然吸引着文学的主要目光，时政小说的现实感、历史意识和批判意识更为突出；女性写作随着台湾妇女运动的高涨和学院派女性主义学者的涌现，其主体意识则更增强了自我反省的色彩，特别是深受“解构男性神话”、“身体政治”、“边缘反抗”等女性主义学理批评的影响，女性写作的政治视野更为活泛，情欲

书写亦显“胆识”；而都市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等文学思潮则更以“新世代”作家为创作主体，其创作意旨在传承一般意义上的现实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基础上，表现出更为实际的、具体的问题意识，社会转趋富裕后的“富贵病”、后现代社会人性的驳杂与诡谲往往被他们所津津乐道；同时，伴随着社会消费文化的弥漫，文学的消费性也日趋明显，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逐渐消弭。随着世界文化交流和碰撞趋势的日益深化，新旧世纪交替时期的丰富的文学发展态势正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走向 21 世纪，进入一个更为繁复、更为多元、更为平实的文学环流。

质言之，台湾新文学的百年历史始终贯穿着对抗强权、民族回归、文化认同的文学精神，并因此而极大地丰富了“一个中国”的文学历史，“一个中国”的文学精神。

第二节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辩证

或许是台湾在文化地理上的极其特殊性，决定了她命运的多劫；同样，又恰恰是台湾文化地理上的极其特殊性，锻造了她特别坚忍、特别顽强、特别具有民族意志的品格，乃至在历经了无数的历史劫难，对民族融合的企盼，对中华文化的坚决认同，仍表现出“九死而不悔”的执著。于是，在这一历史前提下进入两岸文学关系的辩证思考，我们就有了一种血浓于水却又充分现代的理性。

无疑，两岸文学的关系最凸显的当集中于两岸在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下所发生和发展的 1949 年以后的文学。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两岸当代文学的意识形态关系？

一般来说，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包括法律设施、政治设施以及同这些设施相适应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等形式的意识形态。因此，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是毫无疑义的；而“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既具有对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及社会生活与矛盾的认识功能，又具有基于一定的立场、信念、理想和实践目的而对社会生活的思想、情感进行价值性评判”。而如果它恰恰代表了一定社会的话语权力对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及社会生活与矛盾的认识功能，并且是以一定社会的权力话语的立场、信念、理想和实践目的而对社会生活的思想、情感上进行价值性评判，那么它便是一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同样是毫无疑义的。

如此说来，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权力，表现在社会结构的重组或者“新秩序”的建设这样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必然会构成对整个社会历史空间的强有力的覆盖和制约。比如 20 世纪 40 年代末中国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所造成的两岸不同的特定的社会历史局面，以及都面临着社会结构的重组或者“新秩序”的建设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它们无疑都受到了代表一定社会权力话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强有力地覆盖和制约。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处于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的文学，它不可能不是一定社会的话语权力对社会生活矛盾的认识功能、情感上价值评判的精神代表。正是它与主流意识形态这种特别暧昧的关系，有时甚至达到了难以剥离的胶着状态，自然就充当了这一政治权力的意志的体现者。

处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的台湾当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诚如白先勇所言，从火车站到啤酒瓶商标都贴满了“反共复国”的标语。而浸淫于此间的台湾当局主流

意识形态的文学，所谓的“战斗文艺”、“反共文学”，其本质能指几近被阉割，自觉不自觉地服从于台湾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规定性，进而成为了政治权力的“代言人”。这当然已经是台湾当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意志的物态表现。因此，它最终被作为“反共八股”而遭到唾弃也就不奇怪了。

新中国成立伊始的祖国大陆文学，诸如“工农兵文学”，如果说也服从于社会的规定性的话，毕竟其社会的规定性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这股“工农兵文学思潮”被作为政治权力的“代言人”，其审美价值固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略，但它毕竟表现出了在“新秩序”建构之时的一定意义的积极性。而且，处于这一历史语境中的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无疑更多的是关联与缝合。这种关联与缝合则表现在适应和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地、直接地、明快地、通俗地展示要求。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农兵文学”，其“良好愿望”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非常痛心的是，随着极“左”思潮的愈演愈烈，社会的进程逐渐背离了富国强民的历史渴望，文学最终也无法幸免遭至“奴役”。

至此，如果说海峡两岸的当代文学虽然发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服从于不同的社会（地区）意识形态的规定性，但是它们都表现出了某些相同所在。那就是，当我们完全剥离了两者不同的政治的、权力意志的，甚至是情感态度的相关层面，它们最后所裸露出来的都同样的只是功利的、工具的、物态的意义了。进言之，从意识形态应有的内涵来说，政治意识形态只是其中之一，哲学意识、宗教意识、审美意识等同样是构成文学历史话语的意识形态内容。但在“工农兵文学思潮”和“反共文学思潮”历史文本中，除了被党史、社会科学史或权力意志已经证明或“命名”的政治结论以外，哲学意识、宗教意识、审美意识这样的提法则显得十分奢侈；而且，构成特定社会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也应该是多层次多向度的，有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有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形态，还有民间意识形态。三者应该构成一种多维的、有序的对话关系。但遗憾的是，在“工农兵文学思潮”与“反共文学思潮”历史话语中，我们几乎听不到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声音。这些无疑都曾给两岸的文学造成了深刻的创伤。

诚然，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固然有服从于一定的社会规定性的一面，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学就仅仅是那个历史条件下的权力话语的反映。就整体而言，一个时代的文学所反映的应该是整个时代所有阶级的意识，即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它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而且，文学毕竟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这就使得它作为人类掌握现实的一种特殊方式，作为反映并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又是应该有其特殊规定性的。从根本上说，其特殊规定性就在于形象化方式的审美性及其自由性和超越性。因此，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主流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秩序基本排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不断相互适应和协调，它便不再是以一种强权的姿态出现，相反，与经济基础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这样，在此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学的本质功能、文学的特殊规定性便获得了一个释放的空间，以形象或意境来表征真实的现实生活关系，把一般意识形态所隐蔽的现实生活关系揭示出来，对社会、对思维、对情感，或曰对真善美与假丑恶实现其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实现的启蒙意义。祖国大陆文学在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台湾地区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解严”之后便是如此。

我们当然不能模糊海峡两岸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也不是历史的态度。但是，台湾文学经过对“反共八股”和所谓的“战斗文艺”的反动以及一度“西化”的迷误，在“乡土文学”的论争中重新自省。就整体而言，终于回归文学主体，在现代与传统的交融中，在对现实的关注与发言中实现文学精神的“软着陆”；而祖国大陆文学则在极“左”思潮发展到极端之后，以社会改革为先导，也终于走向了开放，在主体与价值理性的思辨与重构中，趋向文学的人文终极。海峡两岸当代文学经由背离和历史挫动，在文学的意识形态对立性的逐渐淡化中，以主体回归的意义互相关怀，互相趋近，其殊途同归的动人态势毕竟是令人兴奋和期待的。

质言之，祖国大陆就是深厚博大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源之所在、根之所在。尤其是1949年政治格局的大变动，祖国大陆的历史抉择，从根本上说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代表了民族的意志。如果说在文化意义上海峡彼岸是祖国大陆历史文化的拓展和延续的话，那么表现在文学上，彼此的关系无疑就是支流与主流的关系。事实上，作为中华民族文学主流的祖国大陆文学，从来都表现出了她所具有的海纳百川的气度。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对台湾地区的星火传播，就从整体上深化了台湾地区的反殖民主义文学运动；20世纪50年代以后，虽然随着政治体制的根本对立，彼此在意识形态、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日渐深刻背离，但如果我们不怀任何偏见地正视历史，就会看到，民族文化的超越力、融合力、包容力仍高高地悬浮于万物之上又深深地潜流于“一个中国”的历史文化版图和两岸手足的心田之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新旧世纪交替，世界文化交流和碰撞趋势日益深化，文化认同与精神寻根深入人心的世界浪潮中，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根本代表，祖国大陆文学又以她开放的胸怀吸纳了台湾地区文学，从而使彼岸文学在对中国文学的承传中改变了偏狭之见，也为中国文学新秩序的重构展示了深刻的可能。诚如台湾一批当代文学的先行者所言：“我们从冬蛰中苏醒；用炽热的、渴望家园的情怀，从海峡此岸，张望彼岸；从海峡彼岸，张望此岸。亿万年前，大陆与台湾本是相连的，本是一体；后因地壳变动，把它们分了开来。地壳有一天也许再度滚动，把它们连在一起；现在，让我们用爱心、用互信，增加共识，促进交流。”

【第一章】

日本侵占时期的台湾文学

第一节 祖国大陆移民文学与台湾新文学的萌芽

远古时代的台湾与大陆本为一体，地壳的运动使部分陆地成为海峡，从而形成了海岛台湾。台湾考古学者在台南县左镇发现的以“左镇人”命名的古人类化石，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同属3万年以前的古人类，台湾陆续出土的石器、骨器、黑陶、彩陶等，也与大陆各地发掘出的古遗物相似，远古时代的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文化根脉上同为一体。移入台湾列岛诸屿的居民，最初是南岛语系的高山族（共12个族群），中期是操古代河洛地区方言的闽南人和从中原一路南迁的粤东客家人，晚近还有小批陆续来自中国港澳、南洋及世界各地的华侨、难胞，近期是大量来自祖国大陆的各族同胞。

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兴衰利弊，直接关系到台湾一隅的悲欢荣辱。1662年，台湾人民配合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大军赶走荷兰侵略者，收复了台湾。其后，台湾在郑成功等人的大力经营下，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1683年，清朝进军澎湖，控制台湾。次年，清廷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这一时期，海峡两岸联系密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息息相通，由祖国大陆移居台湾的同胞也不断增多。到1811年，不包括高山族同胞在内，台湾居民就达200万人，较郑氏父子统治时期增加近10倍。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清廷陆续在台湾增设行政机构。1885年，正式将台湾省划为当时中国的一个行省，任命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广招闽粤沿海居民移居台湾，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为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台湾文化源自唐宋文化传统，千百年以来闽粤人民无比顽强地捍卫并较完整地携至这块东南海疆悉心培植。自19世纪后半叶始，台澎列岛的社会形态逐渐由移垦社会演进到与祖国大陆各地相同的文治社会。台湾文化在内地化的过程中成为了中国历史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台湾人民和祖国大陆诸省人民信奉相同的神祇，遵守相同的道德标准，士子们一样投身于科举制度，采用同一水平的生产技术和方法。但是，这一时期的台湾在内地化的同时，面对列强的竞相侵扰也在积极地寻求革新自救。

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无能的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面霸占了台湾省。翌年，日本以法律第63号，发布《关于施行于台湾之法律》（即所谓《六三法》），赋予“台湾总督”以“所颁布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的特权。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实行封

建独裁的总督统治，台湾同胞陷入空前的劫难。面对入侵与统治，不愿做奴隶的台湾同胞揭竿而起，组织义军保家卫国。燃遍全岛的武装抗日战火，虽被日本殖民者逐一扑灭，但各种形式的起义暴动依旧此伏彼起。占据台湾的日本侵略者同所有殖民主义者一样，试图从根本上铲除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他们一面挥舞战刀任意杀戮台湾人民，一面宣扬“大和文化”，强制推行野蛮的同化政策。他们定日语为“国语”，实行不平等的差别教育，推广日本服饰，强制信奉“天照大神”……台湾地区的本土文化陷入了极为险恶的境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着殖民文化的野蛮践踏与毁灭性打击。

捍卫民族传统文化、开展文化战线上的反同化斗争是台湾同胞的首要任务。日军占据台湾伊始，台胞在组织义军掀起武装抗日斗争的同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汉学运动。为了有效地延续中华文化，彰显民族精神，抵制日本同化教育，台湾同胞创办了大量的私塾（或义塾）。据查，1897年全台共有私塾1127所，5年后又增至1822所。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的早期先锋人物赖和、张我军等人都是在私塾里接受了民族传统与汉文学的启蒙教育。私塾运动在培育民族文化战士方面做出了可贵却又鲜为人知的贡献。与此同时，台湾知识界兴起了汉诗热。在那个“无泪可挥唯说诗”的年代，爱国知识分子纷纷组织诗社，唱和联吟，互诉衷曲，借以“希延汉学于一线”、“维系斯文于不坠”。吴浊流在《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中，忆到诗社活动时说：“我入栗社之后才知旧读书人”“骨子里，汉节凛然”，从他们那里“学习不少爱国诗词”。汉诗运动在延续民族文化、培养民族气节、教育子孙后代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民族意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同化与反同化斗争也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本殖民者定日语为“国语”，可千万台胞仍坚持终身说汉语，穿汉装，赖和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日本人执意要改变台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台胞则针锋相对地建祠堂、修族谱，教育后代不要数典忘祖。日本人要台胞除去汉装、剪掉辫发，台胞便组织“保发会”、“守发谊”等团体公然抵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或许有人以为当年台湾保护辫发的举动未免显得“保守”、“落后”，但是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面对来自殖民者的各种精神凌辱，保护辫发其实质是关系到维护民族尊严和祖国意识的大事。台湾同胞顽强不屈地坚持文化战线上的反同化斗争，与武装抗日活动相辅相成，有效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抵制了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培育了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一代爱国青年。倘没有文化战线上延续二十余年的反同化斗争，倘没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意识与祖国意识，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是无从产生的。

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烙有明显的封建印痕，这往往被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所利用。以台湾的汉诗运动为例，汉诗热兴起之后，日本殖民当局摆出“大兴文教，礼遇贤士”的架势，怀柔收揽，力图扭转汉诗运动方向。历任日本台湾总督更是微笑登场，“奖励风雅”，垂范于先，御用报纸鸣锣开道，“招贤纳士”，鼓噪于后。到了20世纪20年代，殖民当局与封建势力的勾结，终于导致汉诗运动走入末流。这表明，台湾同胞在文化战线上的反同化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在反对殖民文化的同时担负起反对封建文化的历史重任。台湾老一代知识分子显然是无力完成这一使命的，历史的重担天然地落在了新一代知识青年的肩上。

这一代青年出生于日本侵占台湾前后，成长于已沦为殖民地的台湾。按照日本殖民者的意愿，这一代人应该是被同化了的一代。果真如此，他们也就变成民族文化断裂的一代。可是他们目睹了日本殖民当局的种种暴行，亲历了殖民统治带给中华民族、台湾社会

和个人家庭的诸多灾难，领受了延续二十余年的武装抗日和反同化斗争的教育。诸多因素使他们成为接过父辈未竟事业、争取民族解放的生力军。所以，当他们抱着探求台湾出路的意愿或去日本留学，或回祖国大陆读书，一旦接触到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一旦领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旦倾听到祖国母亲的召唤，便满怀赤子之心，英勇百倍地奔向了新文化运动的战场。

20世纪20年代，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

五四运动的春雷惊天动地，在日本留学的台湾知识青年莫不欢欣鼓舞，群情振奋。1919年秋，在东京的台湾留日学生蔡惠如、林呈禄、蔡培火等人，联络“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主事马伯援、吴有容，为声援响应五四运动，取“同声相应”之意，在东京成立了台湾留日学生中第一个民族运动团体“声应会”。但因会员不多且流动性大，组织成立不久便在不知不觉中销声息影。

1919年末，林献堂、蔡惠如在东京，蔡式穀、林呈禄等也经常在日本居住。东京台湾留学生早已有青年会之组织，这是一个同乡交谊性质的团体。在此青年会中，有一些比较年长而热心政治的成员与他们过从甚密，经常交换有关台湾政治社会改革的意见。后来，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启发会”，“启发会”的会员有郑松筠、罗万傅、蔡玉麟、谢溪秋、谢星楼、彭华英、林仲澍、王敏川、黄呈聪、黄周、吴三连、王金海、黄登洲、吕磐石、吕灵石、陈妮树、刘明朝、汪垂胜、林攀龙、蔡培火等人。其成员虽不足百名，但是来源相当复杂。后来由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该会不久就归于似有似无。

1920年1月，蔡惠如深感有组织团体以开展政治活动之必要，与林呈禄商谈之后决心重新组织团体。1920年1月8日，蔡惠如邀请原“启发会”会员11人，于日本神田中华第一楼召开了创立组织协商会，与会人士一致同意并决定于1920年1月13日在东京涩谷区蔡惠如的寓所召开成立大会。会名由蔡惠如提议，取《大学》篇中“作新民”之义，定为“新民会”，林献堂、蔡惠如任正、副会长。“新民会”确定了三个行动目标：

第一，积极推动台湾的社会政治改革。在活动之初，“新民会”决定继续开展“六三法撤废”运动。1920年10月，留日台湾学生两百余人曾在东京召开撤废“六三法”示威集会。但是，“六三法撤废”运动未能跳出“日台一体”的政治藩篱。随着五四运动影响的日益深化，林呈禄提出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取代撤废“六三法”运动。林呈禄提醒人们要摆脱日本“同化主义”束缚，为争取民族自治、自决与自主而斗争。此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坚持了15年之久。

第二，创办机关刊物，以启迪民智。办刊首先遇到的就是经费困难。经过大约半年准备，刊物仿照祖国大陆的《新青年》取名为“台湾青年”，于1920年7月正式创刊。创刊号的“卷头辞”写道：

……觉醒了讨厌黑暗，追慕光明；觉醒了反抗横暴，服从正义，觉醒了摈除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野蛮生活，企图共存的、牺牲的文化运动。你看，国际联盟的成立，民族自觉的尊重，男女同权的实现，劳资协调的运动等，没有一项不是大觉醒所赐予的结果。

又说：

吾人深思熟虑的结果，终于这样觉醒了。即广泛地侧耳听取内外的言论，应该摄取的，则细大不漏地摄取，作为自己的养分……以爱护和平为前提，讲究自新自强的途径……

“黑暗”、“横暴”、“野蛮”等等使人想到凶残的日本殖民统治，“光明”、“正义”则与“民族自决的尊重”紧密相连。一再号召的“觉醒”正是对台湾同胞民族意识执著而深情的呼唤。反对殖民文化侵蚀，追求民族文化革新，通过台胞的自新自强实现民族解放，是这篇卷头辞的思想核心，也是“新民会”与《台湾青年》杂志的指导思想。这份杂志共出版了18期，在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推动台湾社会民族民主改革运动的中心。

第三，密切与祖国人民的联系。“新民会”委派蔡惠如、林呈禄等先后回到祖国大陆与中国国民党接触。为唤起民众，他们还利用节假日组织“巡回讲演团”返回台湾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新民会”的成立标志着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此后10年内，发生在台湾的重大政治活动，诸如“六三法”撤废运动、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新台湾联盟、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党、台湾民众党、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等等，均与“新民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新民会”的成立宗旨及其活动雄辩地说明台湾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是台湾同胞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权利的民族革命运动，是文化战线上台胞坚持了25年的反同化斗争的新发展。其根本特征是认同祖国，并把反对封建主义纳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之中。

有意思的是，这场矛头直接指向日本殖民统治的新文化运动，竟然是在日本东京酝酿、组织与发动的。这一表面看来不合常理的现象在事实上说明了：（1）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台湾的统治较之日本本土更为残酷。（2）东京是日本帝国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使东京与世界各国的信息交流较日本其他地区更为迅速集中。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既可及时接触世界新思潮，又能较多了解祖国大陆新态势。日本当局是无法令这些来自殖民地的知识青年长久处于封闭状态的。于是，留日的台湾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意识与民主思想便异常迅猛地发展起来。（3）台湾与祖国大陆隔海相望，日本侵占台湾后虽然两地难以直接沟通，然而日本东京分别与祖国大陆及台湾保有联系。在东京有中国使馆，有中国侨民和留学生。这样，东京自然成为祖国大陆与台湾互通信息的纽带。历史和日本帝国主义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恰恰是日本的首都变成了祖国大陆向台湾输送新文化运动火种的转运站，正是东京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与深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条件，通过“新民会”在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架起了一座神奇的桥梁。新文化运动经由这座重要的桥梁深入到台湾本岛开花结果。

1921年10月，在“新民会”与林献堂的支持下，开业医师蒋渭水联合医师吴海水等人，在台北创建了“台湾文化协会”。蒋渭水任专务理事，林献堂为总理，蔡惠如等人亦被选为理事。

“台湾文化协会”是在台湾岛上成立的第一个文化界大型群众团体，拥有会员1032人，主要由台北部分院校的学生和台中部分居民组成。它罗致了当时台湾的青年才俊，成为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的中坚。

不过，“台湾文化协会”代表人物的思想状况和政治倾向不尽一致。如林献堂受梁启超社会改良思想影响较多，被视为“改良派”，主张通过合法手段去争取民族自决权，故又被日本殖民当局看作“自治主义派”的核心人物；连温卿、王敏川等人接受了社会主义